

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性质及外在推力探析

——兼论大罢工对苏兆征的影响

赵 薇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48)

[摘要] 1922年发生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其性质最初是海员自发组织的、以谋求工作待遇改善的经济斗争。但随着港英政府的介入,罢工斗争的性质逐渐演变为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政治斗争。从外部推力来看,香港海员大罢工的爆发与“一战”后世界工运局势变化有所关联。同时,它也受到香港工运传统的影响。在这场罢工运动中,工人领袖苏兆征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罢工运动也反作用于苏兆征本人,使其思想意识特别是对革命问题的认知有了显著提升,领导组织动员工人开展斗争的能力得到锻炼,为他迅速成长为卓越的工人领袖、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世界工运领袖之一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香港海员大罢工; 香港海员工会; 经济斗争; 政治斗争; 苏兆征

[中图分类号] K261.36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6008 (2021) 06-0052-11
DOI:10.19434/j.cnki.ghllyj.2021.06.005

1922年1月爆发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工人斗争。这次罢工掀开了中国工人运动崭新的一页,培养了一些卓越的工人运动领导人。近代中国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著名的世界工运领袖之一——苏兆征就是其中的代表。学术界过去曾对香港海员大罢工这场工人运动给予充分的关注,围绕工人运动本身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探讨的

问题包括香港海员大罢工本身的发生发展情况分析,如金应熙、孙艳都具体探讨了香港海员大罢工的组织与发展问题。^①有的学者则集中讨论了香港海员大罢工中的领导权问题,如刘丽、裨倩红等人围绕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的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展开了讨论;^②莫世祥、王河、葛坤英等则是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视角集中探讨了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意义和作用;^③元邦建、蒋永清、赵爱

[收稿日期] 2021-03-15

[作者简介] 赵薇,历史学博士,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工人与工会历史、中国当代社会史。

^① 金应熙:《关于1922年香港海员罢工的几个问题》,载《学术研究》,1962年第3期;孙艳:《香港海员罢工中苏兆征与林伟民的分工与协作》,载《工会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

^② 刘丽:《香港海员大罢工是国民党领导的》,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裨倩红、卢权:《香港海员大罢工是国民党领导的吗?》,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5期。

^③ 莫世祥:《也谈国共两党和香港海员大罢工——兼订正马林报告中的不实之词》,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5期;王河:《香港海员大罢工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0年第4期;葛坤英、周文顺:《国共关系史上划时代的一页——香港海员大罢工探论》,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伦、陈刘贞洁等人则从香港工运与中国共产党在港发展的大视角出发探讨了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的地位和意义。^①此外，还有许多叙述性的文章和工运通史对香港海员大罢工进行了介绍。

无疑，上述成果对研究香港海员大罢工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是关于这次大罢工仍有值得进一步讨论及补充之处。一方面，在围绕这次罢工运动的性质问题以及罢工斗争的外部促成因素的问题等方面，以往研究不甚充分，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另一方面，以往研究在涉及罢工领导人苏兆征的问题上，倾向强调苏兆征本人对此次罢工运动的贡献，而反观这场重要罢工运动对苏兆征本人的影响，研究却属薄弱，对于工运人物的研究略显遗憾。故笔者不揣浅陋，拟对上述问题做一些分析，以便能够对香港海员大罢工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增进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工人运动的特点，以及党在建立初期的革命方针。

一、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性质探析

香港海员大罢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历时56天，最终以海员的胜利而告终，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邓中夏称赞其“掀起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第一怒涛”。^②1922年1月到

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第一次高潮，这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就是香港海员大罢工。^③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对这次罢工性质的探讨却较为笼统。通过对这次罢工运动的全面考察，我们可以看出，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性质其实经历了一个动态过程，在不同的运动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性质，经历了一个由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的转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由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的转变过程中，它还发生了一个由阶级斗争向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并存的转变。

这场罢工运动最初的诉求只是集中在经济领域。当时工人们主要围绕着提升工资待遇的诉求开展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海员的思想观念与阶级意识日渐觉醒。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香港海员于1921年成立了香港海员工会，孙中山专门为其招牌题字。海员工会甫一成立，就决定其当前斗争目标就是要求增加工资。着力解决经济问题的原因之一，即是在工会成立时，海员的工资已有两年多的时间未有变化，但货币此时已经贬值50%之多。^④为了实现增加工资这一核心诉求，海员加工维持团得以筹建。1921年9月，海员向资方提出了三项要求，第一项就是增加工资：工资低于10元的增加50%，10—20元的增加40%，20—30元的增加30%，30—40元的增加20%，40元以上的增加10%；第二，工会有支配工

① 元邦建：《香港工人运动历史的几个特点》，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蒋永清：《话说香港工运》，载《中国工运》，1997年第5期；赵爱伦、唐振宇：《香港工人阶级的产生与工人运动的发展》，载《龙江党史》，1997年第3期；陈刘贞洁、吴慧坚：《共产运动在粤萌芽及向港扩展（1921-1923）》，载《广东党史》，2009年第3期。

②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载邓中夏：《邓中夏全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83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页。

④ Chan Lau Kit-ching, *China, Britain and Hong Kong 1895-1945*, H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70.

人权（即职业介绍权）；第三，签订雇工合同时，工会有权派出代表参加。^①第一项是明确的工资诉求，后两项的诉求则是希望建立平等的劳资关系。当资方拒绝这一要求后，海员又相继两次提出提高待遇的要求，且其要求都没有超越第一次的内容，即始终围绕着提高工资、改善工作待遇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由此可见，工人们的斗争在开始阶段是一种典型的经济斗争。即便在此期间港英政府介入其中，但工人们的核心诉求并没有发生改变。

促使香港海员工人罢工运动的性质发生改变的直接事件，则是港英政府对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取缔。起初，港英政府在罢工运动中持“中立”态度，并在劳资双方之间进行调停。但由于劳资双方的分歧过大，调停失败，工人的罢工依然在持续。然而，由于航运业在香港的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长期的罢工对香港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因此港英政府认为罢工运动会对香港经济带来严重后果，开始将罢工运动定性为极端分子扰乱殖民地的政治事件，^②决定采取强硬手段来处理罢工活动。1922年2月1日，时任香港总督司徒拔（Reginald Stubbs）宣称海员工会妨害社会治安与秩序，属于非法组织，查封了海员工会总部，逮捕了工会的办事人员，并摘下了海员工会的招牌。前文已述，这块招牌是当年工会成立时，孙中山专门题写的。查封事件的发生，表明港英政府已经全面倒向资方，不再是调停劳资双方关系的所谓“中立”角色。查封海员工会之后，港英政府还凭借手中的政治权力，颁布

了所谓的《紧急状态条例》，禁止张贴海报和举行公众集会。港英政府立法局还授予警察部门更大的权力，允许他们检查邮件和进行人身搜查。

通过这起事件可以看出，原本属于劳资纠纷的经济斗争，由于港英政府的阶级立场，开始发展成一场政治斗争，演变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抗争。这使得香港海员罢工的性质开始从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转变。

面对港英政府的高压政策，香港海员并未屈服。在海员工会的领导下，大批工人离开香港，返回广东。他们回到广东后，受到了当时广东政权的热烈欢迎，得到了妥善安置。与之相反，香港由于粮食短缺，物资流通停滞，社会状况日益恶化。为此，港英政府和资方又试图通过协商解决罢工问题。立足现实，在接下来的罢工斗争中，海员们提出的谈判内容也开始突破唯经济诉求的情况，增加了关于政治方面的一些要求。

海员工会内部通过会议协商，提出除了之前的经济诉求外，增加几项与海员的政治权利有关的内容，即“恢复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原状及现被查封各工团与被拘禁之办事人”，“所有派员及办事人在港不得平定入罪递解出境”，特别强调要“先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恢复原状即行开始调处”。^③对于港英政府而言，此时如果接受海员们的条件，就意味着否定了之前自己所做出的决定。在其看来，这是不可接受的，是对港英政府权威的挑战。因此，港英政府继续以强硬态度对待罢工，再次拒绝了工人们提出的条件。华民政

^①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载邓中夏：《邓中夏全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83-1384页。

^② Chan Lau Kit-ching, *China, Britain and Hong Kong 1895-1945*, H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75.

^③ 《港海员罢工近况仍无解决希望》，载《申报》，1922年2月14日。

司^①夏理德 (Edwin Hallifax) 更是对恢复海员工会这一诉求明确拒绝, 表示“该工会已为本港政府行政机关会议认为不合例之会社, 已经解散, 断难令其存在”。^②

在港华人中, 处在社会底层的劳工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 但社会地位却十分低下, 在劳资关系中更是如此。与此同时, 一些人认为在港华人大多“均非本地出生、亦非英籍人士, 而他们多为来自广东为谋求生计而移居香港的华人, 在心态上常自视为暂居的‘过客’, 极少真心愿意向英廷效予政治忠诚, 绝少成为‘英皇子民’, 他们只以香港作为就业、营商的‘职场’或往海外升学工作的‘跳板’和‘通道’, 无深厚的归属感。所以从英殖当局的官方立场角度而言, 这批占着香港人口大多数的‘居港华人’着实是政治忠诚不可靠赖, 英式文化浸洗不足的‘借来的人口’。”^③面对日益汹涌的罢工斗争和海员提出的条件, 港英政府对局势的判断也开始向民族抗争方面倾斜。香港总督司徒拔在向英国殖民地部报告罢工情况时说: “形势有些严峻, 因为海员罢工不单纯是一场经济运动, 而是一场政治运动……其最终目的无疑是迫使英国人撤出香港。”^④

特别是海员工人发起罢工后, 越来越

多的华工参与到罢工之中。港英政府的高压政策直接刺激了香港海员及其他行业工人的民族感情, 更是成为导致1922年2月下旬香港总同盟罢工形成的重要原因。港英政府在给英国政府的正式报告中再次重申了这一点, 认为“随着斗争的持续, 种族因素日趋显著, 该因素在整个事件的背后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⑤可以说, 港英政府对时局的这一判断是准确的。还需注意的是, 在当时香港的海运行业中, 特别是远洋航运中, 外资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像当时拥有轮船最多的昌兴公司与太古公司, 甚至要求香港当局出头压制海员。^⑥因而海员工人的斗争已经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基于经济矛盾的阶级斗争, 其斗争对象还包括以港英政府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如邓中夏所言, 这场运动已经“实际带着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意义”。^⑦特别是香港海员大罢工发展到后期, “沙田惨案”更被视为被殖民者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斗争。罢工性质再次升级, 从阶级斗争上升到民族斗争的层面。因此, 我们可以发现香港海员大罢工的历史发展其实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 蕴含着三种性质, 是“一战”后香港经济矛盾、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共同刺激的结果。

① 华民政务司为港督在华人事务方面的主要顾问, 是香港高级行政官员之一。其主要职责是负责联络华人团体、了解华人社会的情况和动向。华民政务司是行政局、立法局和市政局的当然官守议员, 在华人事务方面权力很大。

② 《港海员罢工近况仍无解决希望》, 载《申报》, 1922年2月14日。

③ 陈明:《香港与孙中山革命运动之多元关系(1895-1925): 革命基地兼革命对象的重叠角色》, 载麦劲生、李金强编著:《共和维新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论文集》,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237页。

④ 刘蜀永主编:《简明香港史》, 香港: 三联书店2016年版, 第144页。

⑤ 刘蜀永主编:《简明香港史》, 香港: 三联书店2016年版, 第145页。

⑥ 刘达潮:《广东海员的战斗历程》, 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广东党史资料(第2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72页。

⑦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 载邓中夏:《邓中夏全集(下)》,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第1400页。

二、两种作用力——国际工运与香港工运传统

香港海员大罢工的爆发，就其直接因素来看，是由于海员工资微薄及人格尊严低下，但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当我们把视角拓展到国际工运以及香港社会原有的工运历史传统时，便不难发现香港海员大罢工的爆发，深受国际工运局势和香港工运传统的共同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香港虽然也有工人反抗运动，但其规模无法与后来的工人运动相比。香港工人运动大规模的兴起源自“一战”之后。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影响迅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掀起了一股革命高潮。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进行了重构。

“一战”结束后，经济的恢复为资本主义世界重新带来了繁荣。在英国，消费与生产恢复后，市场兴旺，英国的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然而，这种繁荣的景象也造成了许多“资本家进行不够精明的投资，特别是投资于纺织、钢铁、造船和工程等已经过于膨胀的工业部门。他们的投资进一步扩大了以上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其中，一些新的大公司则是以虚高的股票价值为基础合并而成。这场繁荣，一年之内就将物价提高10%。因为工资增长落在了物价上扬后面，于是1919年至1920年间，便发生了约2000次罢工，参加罢工工人达250万”。^①

这种经济情况也直接影响了作为英国

殖民地的香港。“从1911年到1924年省港大罢工前，香港的转口贸易增长较快，从一战结束后到省港大罢工前这段时间增幅尤为明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商人利用战后欧洲各国经济疲软，无暇东顾，和战后各国经济恢复期对生产和日用消费品的旺盛需求，以及内地民族工商业在一战期间的崛起等诸多利好条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香港的对外贸易强力反弹，贸易额急剧上升。”^②这些经济变化最显著的结果之一就是香港工人特别是海员数量急剧增加，这为日后香港海员发起的大罢工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与传统产业工人相比，海员们常年从事海运工作，因为职业特点，他们经常前往世界各地。这使得他们更容易了解外部的世界，能够快速而直接地感受到世界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一战”之后，欧洲及亚洲地区掀起了工人运动高潮。在欧洲，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芬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都爆发了工人运动。英国的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在亚洲，日本和朝鲜也兴起了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运动。香港海员在工作中接触或了解到这些工人运动，对此产生很浓厚的兴趣，并对这些斗争给予极高的评价。

受这些运动的影响，海员工人们的思想认识及觉悟得到了显著提高。一些海员评论说：“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我们很快就听到了。因为当时不少白俄分子从俄国逃跑出来，有的搭船前往上海。他们在船上把十月革命的事情讲开了，我们因而也听到了。船航行到各国港口，我们又从当地辗转听到，

^① 克莱顿·罗伯茨、戴维·罗伯茨、道格拉斯·R.比松著，潘兴明等译：《英国史（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20页。

^② 刘蜀永主编：《简明香港史》，香港：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64页。

从中受到很大鼓舞，憧憬着将来也能有这样的一天就好了。我们还看到了欧美各国工人在‘五一’劳动节等节日中英举行示威游行及组织工会的情况。因为工人们团结和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他们的利益也就有了一些保障。我们从中受到了启发，也想成立工会。”^①因而，这种外在环境的熏染，对于工人革命意识的提高及工人组织建设产生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从香港社会内部而言，自香港开埠以来，工人阶级就有着比较强烈的反压迫意识。特别是在海员群体当中，这种反抗意识具有相当长的历史传统。从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香港海员曾多次自发组织过反殖民、反压迫的斗争。中法战争时期，香港工人就自发组织了拒绝为法国商船提供服务的斗争活动。当时，英国殖民当局曾试图压迫工人的反抗，但在工人们的坚持斗争下，港英政府最终只能听任其“不装法货”。1920年的机器工人大罢工，则为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直接提供了一个具体而成功的案例。当年春天，香港的机器工人在香港华人机器会的组织领导下举行了罢工，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由工会组织的罢工斗争。工人们通过罢工斗争，获得了32.5%的加薪，赢得了罢工的胜利。虽然这场斗争的时间和规模不及后来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但是它的成功却为香港海员大罢工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特别是工会的领导作用，使得香港海员明白了领导组织的重要性和工人团结

的重要性。这些都是香港工人阶级的历史传统。

在外部环境熏染下，革命意识本就有所提高的香港海员工人的行动也就开始了，并且更加看重工人团结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这一要素。其中重要的表现就是1921年3月香港海员工会的正式成立。工会成立后，为了谋求海员生活的改善，就不断增强工人团结，寻求改变，针对海员涨薪问题建立了海员加工维持团。这一组织成立时就发出宣言，号召工人猛醒觉悟，急起直追，完全团结，合力互助，“众擎易举”，“看现在的世界，是工人自由的世界，还是专制魔力的世界”。^②特别对于工会组织而言，呼吁工人建立工会组织已经是“今日的潮流，工团组织，预备将来势力雄厚，一举而把自己固有的人权和幸福，完全取回自己享有”。^③这也解释了为何在香港海员大罢工发生后，海员工人在斗争中始终坚持工会的统一领导，在诉求中始终坚持恢复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合法性的原因及意义。

所以，从国际工运史和香港工人运动发展史的角度，我们能看到其对香港海员大罢工的影响。香港海员大罢工反映出香港工人运动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已经日臻成熟。香港海员工人掀起的这场斗争不仅对中国的工人运动有着重要意义，它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是20世纪20年代亚洲地区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一起标志性事件。

^① 刘达潮：《广东海员的战斗历程》，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广东党史资料（第2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4-65页。

^② 《海员加工维持团宣言》，载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状况与工人运动（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211页。

^③ 《海员加工维持团宣言》，载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状况与工人运动（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

三、香港海员大罢工对苏兆征的影响

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中，作为罢工领导的苏兆征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位出生于广东珠海的海员，成为这次大罢工的领导核心。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大多侧重介绍和分析苏兆征对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其实反观这次罢工，它也对苏兆征的思想认知及人生际遇产生了重要影响。

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时，苏兆征刚过36岁的生日，此时的他还仅仅是一名普通的海员工人。然而，在其人生最后的7年时光中，苏兆征却迅速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国际工运和赤色工会国际领袖之一。这种人生经历其实与香港海员大罢工对其造成的影响密不可分。究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认识与政治素养的提升，二是领导和组织能力方面的锻炼。

在领导海员进行罢工斗争中，苏兆征在思想上明确认清了港英政府的本质。港英政府的根本性质，使得其不可能在劳资纠纷中保持中立，其提出的“出场公断，以期双方各得公平”^①根本无法兑现。在与华民政务司夏理德的谈判中，夏理德提出：“本港政府是不允许此种罢工行动的，你们有条件可交本大人，替你们斟酌办理。你们罢工，不怕饿肚吗？”苏兆征即回复道：“我们提条件已经三次了，而且通知了政府，政府何以早不出来说话？现在我们已经罢工了，要复

工除非完全承认我们的条件。我们饿肚子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政府不必担心。”^②港英政府对罢工运动中的劳方与资方采取的不同态度与行动，也使得这场罢工斗争从初始的劳资冲突转变为政治斗争，更使苏兆征在领导工人斗争时，认识到不仅要反对资方，同时还要反对帝国主义，秉持与港英政府斗争到底的精神。

在领导工人的罢工中，苏兆征也认识到近代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在工人罢工之初，就有资产阶级因担心影响其利益而“污蔑罢工者是自私自利的蠢货”，甚至有的还希望港英政府镇压所有工人的工会组织。^③随着工人斗争高潮迭起，迫使港英政府不得已让步时，中国轮船公司的资本家被委派与工人谋和。资方提出：“我们同是中国人，你们罢工我们是同情的。这样好不好？中国轮船先复工，将来外国轮船答应你们什么条件，我们一样照办。”^④苏兆征认为这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指出：“据你们所说假如你们是同情了我们的罢工，你们为什么对于我们的请求置之不问呢？你们为什么不来帮助我们向港政府提出抗议呢？现在你们说全民族利益，须知你们所说的民族利益实际上就是你们资本家的利益！”^⑤但立足当时形势，他在坚持斗争到底的原则的同时，也试图以爱国之心对中国资本家进行联合，表示“我们同是中国人，中国商人所说的话是不错的，所以我们罢工一开始，便请中国商人替我们帮忙，谁知你们先前不理，对香港

① 《港海员罢工仍在坚持》，载《民国日报》，1922年2月2日。

② 《苏兆征同志传》，载邓中夏：《邓中夏全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8页。

③ 韦尔什著，王皖强、黄亚红译：《香港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8页。

④ 《苏兆征同志传》，载邓中夏：《邓中夏全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9页。

⑤ 游大：《苏兆征与一九二二年的海员罢工》，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中共珠海市委党史办公室编：《苏兆征研究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6-377页。

政府又默然无所表示，今日向我们要求此种特别办法，为罢工全部利益计，这是不可能的。我看中国商人应该发扬中国人的国光，一致逼迫香港政府接受海员的条件，早早解决”。^①可以说，苏兆征认识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本质，看到了资方在工人斗争中对工人的孤立以及对港英政府的软弱与妥协。但立足中国革命形势，在革命中对其进行斗争的同时，仍需对其进行积极争取与联合。

在革命思想方面，他与资产阶级主张劳资调和的思想开始产生距离。在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之初，国民党籍海员陈炳生、翟汉奇等罢工领导曾对举行罢工运动产生过动摇。此前海员工会向资方所提要求一直未获答复，以至于工人向陈炳生等工会领导发出质问。迫于工人压力，陈炳生等请律师于1922年1月12日上午9时向资方发出了最后通牒，限24小时答复，否则一律罢工。虽然已发出通牒，但参加斗争的工人们此时已不愿再继续等待。“激烈之会员大为鼓噪。谓本会经三番四次致函东家，皆不理睬。此种无用之函件，若不先行罢工不特二十四点钟无答复，恐二十四个月亦无答复也。言时极为愤激，甚有将座上茶盅掷地者。主席（即陈炳生）见事势如此乃即退席。当即有人倡请立刻罢工，于是一唱百和，而罢工之举遂实行矣。”^②这里的“激烈派会员”就有苏兆

征。^③他领导“泽生”号轮船的海员在罢工中更是首先发难。^④虽然当时苏兆征也是国民党党员身份，但他在思想上已经与国民党的革命主张，特别是其所奉行的劳资调和思想产生了距离。

在领导海员罢工斗争中，苏兆征认识到工会组织的重要性。他联合林伟民等海员中觉悟高的一些人开始打破传统海员工会中依靠地缘形成帮派等的狭隘界限，建立了海员工会来组织工人。在领导香港海员罢工期间，苏兆征进一步关注工人团结问题。他不断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指出“如果只靠少数人的力量，是很难斗得赢资本家他们的；只有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努力奋斗，他们就没有办法了。”^⑤他对工会组织团结代表工人以及对工会之重要性有着清晰的认识。因此，当港英政府请中国绅士与海员进行谈判时，针对海员工会这一组织，苏兆征始终坚持“先要香港政府完全恢复工会”。^⑥

苏兆征成为罢工领导人之后，在实际的斗争中，他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或许才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真正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给予了罢工海员以积极的支持和实质的援助。广东支部号召罢工工人团结一致、严守秩序、注重自治，特别是要“固结团体”，表示“为其后援，本会之责也”。^⑦其所发文书及对

①《苏兆征同志传》，载邓中夏：《邓中夏全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9页。

②《香港中华海员大罢工尚无转圜希望》，载《申报》，1922年1月22日。

③ 莫世祥：《也谈国共两党和香港海员大罢工——兼订正马林报告中的不实之词》，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5期，第186页。

④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7页。

⑤ 刘达潮：《广东海员的战斗历程》，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广东党史资料（第2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3-74页。

⑥《无法调停之港工潮 两方均不肯让步情势愈趋严重》，载《申报》，1922年3月2日。

⑦《粤共产会致罢工书》，载《民国日报》，1922年2月28日。

海员工人罢工斗争的宣传，参加斗争的香港海员均已知道。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在各地积极开展活动，组织广大工人积极声援和支持香港罢工工人。当时海员工会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之间也建立了联系。中华海员办事处曾致电“劳动组合书记部暨宁浦粤各海员钧鉴：粤海坚持，望书记部联络长江，组团协助”。^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在李启汉等人的组织领导下，联合各工团组建香港海员后援会，积极宣传香港海员工人的正义斗争，发出慰问及声援函电，捐款捐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就“捐银150元”。^②特别是由于当时上海也是海员分布的重地，面对一些航业公司通过包工头招募水手赴港替代香港罢工海员破坏罢工的行为，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积极开展工作，号召海员团结一心、切勿受雇，以免损伤同行斗争。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支持，以及罢工运动的客观现实使得苏兆征认识到依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无法完成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促使其思想开始向马克思主义方向转变。他曾在罢工运动中尝试联系中国共产党，只是因为党组织当时还很弱小，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苏兆征“总找不到手”。^③后来，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并在1925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香港海员大罢工除了对苏兆征革命思想的转变产生重要影响外，在罢工斗争中，

苏兆征担任的工作职务和所负的责任也直接培养并发展了他领导工人运动的组织和动员能力。香港海员大罢工刚开始时，担任海员工会会长的陈炳生在回忆文章中表示他建立了罢工的领导组织，即“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及香港各工团联合办事处”，苏兆征具体负责“欢迎非粤籍工友，接待粤籍工友，管理工友宿舍等招待事宜”。^④然而实际情况是，由于苏兆征坚决与资本家斗争的主张和立场，使他赢得了广大工友们的支持，他被选为罢工总务部的主任，“担任内部行政的全部工作，且担任着对外一切的外交工作”。^⑤他还是负责与资方谈判的代表之一。在斗争中，大家称赞他“坚持原则，拒绝贿赂，对他更加信任了”。^⑥到了1922年2月，陈炳生由于杀妻案返回广州接受调查，苏兆征更是被众推为会长，开始全面领导海员大罢工。因此，可以说苏兆征才是“此次罢工最得力的中心人物”。^⑦也正是在这场罢工运动中，苏兆征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工运领袖。

苏兆征在谈判中逐渐掌握斗争技巧，能够明确地发现问题关键之所在。他在与港英政府谈判中明确指出，“外间每谓局面如此为敝会同人所弄坏，不知政府与船东不谅有以致此地步耳。若敝会办事有错，可传办事人质问明白，宣布罪状，今不问是非，猝然解散。解散后方明令宣布

① 《各工团援助香港海员》，载《民国日报》，1922年1月31日。

② 《香港海员后援会开会记》，载《民国日报》，1922年2月9日。

③ 《苏兆征同志传》，载邓中夏：《邓中夏全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0页。

④ 陈炳生：《中华海员工会与香港海员大罢工回忆》，载《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2期，第12页。

⑤ 游大：《苏兆征与一九二二年的海员罢工》，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苏兆征研究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5页。

⑥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2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页。

⑦ 《苏兆征同志传》，载邓中夏：《邓中夏全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9页。

是为不公云云。”^①之所以如此，其关键问题即是港英政府查封海员工会的行为，既是对海员工会合法性的破坏，更会对工人的合理斗争产生负面影响，事关罢工运动的性质及合法性问题。面对对方提出工会可恢复，“但不是原来称的工会，而应改名，工会招牌不能送还，你们是知道的，这是与政府威信有关，政府不能收了去又送回来”时，他对这一提议强烈反对，明确表示“工会名称是一个字也不能改，工会招牌必要送还”。^②“若不恢复会名，宁愿一齐死在广州城，都不愿回港。”^③

在罢工斗争中，他不仅重视海员团结，还重视联合社会各界力量，以扩大罢工的影响力。他重视工界团结。在罢工期间，他不断呼吁香港的船厂工人、码头工人等同情罢工，以对港英政府造成压力，声援海员之斗争。^④正是依托广大工友的团结组织，使得1922年海员掀起的这次罢工斗争能够历时近两月时间，取得胜利。特别是他在斗争中开始将香港海员罢工斗争与国际工运建立联系。就苏兆征本人而言，早在1914年，他就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在广东组织的太平洋沿岸运输工人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工人运动迅速发展。十月革命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心开始东移，地处亚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成为新的革命中心。结合他本人职业带来的国际视野，他在领导香港海员掀起斗争高潮时，重视将海员工人的斗争与国际工人运动相结合，争取

支援。在当时的广州有苏俄通讯社，苏兆征“每日必到该社请其将罢工消息传布于世界，并请十月革命胜利的苏俄工人予以援助，他又听说法国有个《人道报》是共产党的机关报，所以他又用海员工会名义致电该报，请其将海员罢工的事件传达给全欧无产阶级，予以援助”。^⑤这不仅为其日后成为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打下基础，更推动他深刻认识到中国职工运动与世界工人运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之关系，为其工运思想的成熟提供实践经验。

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给苏兆征带来思想认识的转变以及在工人运动实践中能力的锻炼，使其革命意识与斗争经验得到极大的提升。虽然在这次罢工斗争结束后，苏兆征退出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领导集体，但是他在工人群众中却获得了极高的威望，甚至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关注。1922年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苏兆征与林伟民一起作为香港海员代表参加了会议。自此，苏兆征的影响力开始向全国拓展。可以说，香港海员大罢工直接促成了苏兆征革命思想的转变，并锻炼了其组织和领导能力，为其三年后成功组织领导省港大罢工打下了基础，也为他日后在国内外工人运动中的建树与影响打下基础。

香港海员大罢工在中国近代工人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发端，也是香港历史上重要的民族

① 《港海工潮调停之难点》，载《申报》，1922年2月23日。

② 《苏兆征同志传》，载邓中夏：《邓中夏全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9-1320页。

③ 《港海工潮调停之难点》，载《申报》，1922年2月23日。

④ 文虎：《苏兆征同志传（1930）》，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中共珠海市委党史办公室编：《苏兆征研究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4页。

⑤ 《苏兆征同志传》，载邓中夏：《邓中夏全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0页。

斗争事件。其性质的动态变化是近代中国革命路径的一道缩影——从单纯的经济斗争向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的结合转变。在这场斗争中，作为领导人的苏兆征

在罢工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在这场斗争中获得了极大的成长。这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共创立初期革命领袖的成长历史有着重要意义。

The Nature and External Thrust of the Hong Kong Seamen's Strike and Its Impacts on SU Zhaozheng

ZHAO Wei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Labor Relations, Beijing100048)

Abstract: The Hong Kong Seamen's Strike in 1922 was initially an economic struggle organized by the seamen themselves to seek better working conditions. However, with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British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nature of the strike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 political struggle against class oppression and national oppre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ternal impetus, the outbreak of the Hong Kong Seamen's Strike was related to the changes of the world labor movement after World War I.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changes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Hong Kong. In this strike movement, the workers' leader Su Zhaozhe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he strike movement also had an impact on Su Zhaozheng himself, which significantly enhanced his ideological awareness, especially his knowledge of revolutionary issues, and honed his ability to lead, organize and mobilize workers in struggle,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his rapid growth into an outstanding workers' leader, one of the early lead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world labor movement.

Key words: Hong Kong seamen' union; Hong Kong seamen's Strike; economic conflict; political conflict; SU Zhaozheng

[责任编辑：李 梅]